

## 傅正傳\*

蘇瑞鏘\*\*

傅正（1927-1991），江蘇省高淳縣人，1950 年隨軍來臺，1950 年代晚期擔任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編者，1960 年 5 月當「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正式展開之際，他與雷震是《自由中國》社少數實際參與組黨的人士。同年 9 月 4 日爆發雷震案，他又與雷震同時被統治當局逮捕。26 年後（1986 年），他再度出來參與籌組反對黨，終於和其他愛好民主的人士成功組成民主進步黨，成為戰後臺灣戒嚴時期極少數參與兩次組黨的民主鬥士。從 1950 年代的《自由中國》到 1960 年的「中國民主黨」、再從「中國民主黨」到 1980 年代的「民主進步黨」，他能參與這幾件臺灣戰後史上極為重要的民主「盛事」，更是絕無僅有者。因此，傅正的一生，特別是他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貢獻，頗有介紹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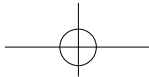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 一、早年生涯

傅正，本名中梅，1927 年 12 月 11 日出生於中國江蘇省高淳縣，

.....

\* 本文第 1-5 節與第 10 節主要改寫自：蘇瑞鏘：〈傅正與 1950 年代臺灣民主運動—以「《自由中國》半月刊」和「『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收入胡健國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4 年），頁 263-318；第 6 節主要改寫自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年），頁 161-178，以下不再贅述。另外，本文之撰寫，承陳宏正先生、陳信傑先生，以及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國立彰化高中歷史科教師。



父傅廷鴻、母王蓮英。他日後回憶指出，在他出生的時候，家境還算不錯，本來「可以過的很幸福」。<sup>1</sup> 但很不幸的是，他出生在一個悲劇的時代；更不幸的是，他又出生在一個悲劇的中國。<sup>2</sup>

當傅正就讀小學四年級那一年（1937年）冬天，中日（八年）戰爭的戰火便燃燒到了他在江南的故鄉。他曾經回憶某一個深夜隨著父母乘一艘小船開始逃難的那一幕：「雞飛、狗叫、牛哭，完全是人間末日景象。」而在他距離日軍占領區只有五十華里處就讀初中時，每逢日軍掃蕩，就要挑著行李逃難。他既痛恨日軍為何如此殘暴，又痛恨自己的國家為何如此衰弱。因此，在1944年冬天，高中還沒有畢業就自動參加了青年軍。<sup>3</sup>

1945年戰爭結束、隔年青年軍復員之後，傅正被分發到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就讀（1946年10月-1947年7月），1947年轉到武漢大學政治系（1947年10月-1949年5月）。不久，國共戰爭局勢逆轉，國民黨棄守武漢，1949年5月他又開始逃亡。<sup>4</sup> 由於嚮往自由，於是跟隨華中長官公署撤退。12月7日到達距離海南島不遠的廣東欽縣，不幸被共軍所困，就在此時，他親眼目睹「白崇禧的所謂三十萬大軍，居然就在一夜之間，不戰而潰」。<sup>5</sup>

1949年底，傅正從廣東的欽州灣偷渡到了海南島。之後他寫了封信給當時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表達來臺灣的意願。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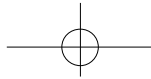
.....  
<sup>1</sup> 「傅正日記」（1959.01.19），收入「雷震·傅正檔案（K0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個人檔案室藏。

<sup>2</sup> 傅正：〈我為什麼兩次參加組黨？〉，收入傅正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頁10。

<sup>3</sup> 傅正，〈我為什麼兩次參加組黨？〉，頁10-11。

<sup>4</sup> 〈傅正先生事略〉，收入國史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七輯》（臺北：國史館，1992年），頁373；〈傅正匪嫌案偵查報告表〉，收入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66-167。

<sup>5</sup> 「傅正日記」（1959.12.07）。



年 4 月底，如願從海南島來到臺灣。<sup>6</sup>

## 二、從「蔣經國之路」到「雷震之路」

來臺之後，他被國防部總政治部分配到新竹國防部政幹班。不到一個月又奉派到駐守嘉義的陸軍第七十五軍政治部服務（1950 年 7 月 -1952 年 7 月），成了蔣經國領導下的一員。1952 年再被調到剛成立不久的政工幹校工作（1952 年 7 月 -1953 年 12 月），專門負責訓練政工幹部，更成了蔣經國直接領導下訓練政工的政工。<sup>7</sup> 然而，就在事業逐漸發展之際，傅正卻在 1953 年底、1954 年初離開了政工幹校，<sup>8</sup> 脫離了蔣經國 / 國民黨當局的集團與路線。

事實上，傅正與蔣經國 / 國民黨當局由親而疏、進而決裂的轉折並非突然，而是有跡可尋。當年傅正「雖然對國民黨並無好感」，但「因為堅決反對共產黨」，而追隨國民政府逃亡。<sup>9</sup> 到達臺灣後，第一個晚上還露宿在高雄海港碼頭上，他便對同學說：「但願國民黨已大澈大悟，這一次不要使我再失望！」<sup>10</sup> 然而，很快地蔣經國 / 國民黨當局的若干作為就令他「再失望」。

例如，1951 年 2 月 25 日，當時隸屬七十五軍政治部的傅正，在一次受訓的結業典禮上聽到蔣經國對他們的訓示。當時蔣要求他們做到兩點：「一是忠實性，這就是要無條件的服從領袖」、「二是鬥爭性，這就要健全的組織，組織者也就是只許我存在、不許別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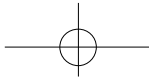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6 傅正：〈從蔣經國到雷震之路！—叫我如何不想他〉，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 年），頁 352-353。

7 傅正：〈從蔣經國到雷震之路！—叫我如何不想他〉，頁 353。

8 傅正：〈從蔣經國到雷震之路！—叫我如何不想他〉，頁 355。

9 「傅正日記」（1959.01.19）。

10 傅正：〈我為什麼兩次參加組黨？〉，頁 14。



在」。<sup>11</sup> 傅正聽了以後相當不以為然，認為：「因為蔣主任在其思想正孕育成長時，只受了蘇聯式的教育，只看到了蘇聯社會的一切現象，因此被迷住了，認為蘇聯的這一種獨裁專制的作法，才是促使蘇聯強盛的唯一原因，因而，他今天的一切鬥爭的方法都是師法蘇聯。」<sup>12</sup>

另外，在七十五軍政治部的這段期間，傅正主要的任務是「建立全軍的國民黨軍隊黨部」，<sup>13</sup>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他在日記當中也逐漸反省到：「似乎民主國家的軍隊裡並沒有任何黨派的活動」、「中華民國是由中國國民黨創造出來的，但是，並不因此而使中華民國變成了國民黨的私有財產」。<sup>14</sup> 就在此時，傅正也已警覺到臺灣正逐漸被國民黨型塑成「講統制思想的極權社會」。<sup>15</sup> 不久，甚至他還認為蔣介石正在走「家天下的老路」，要將大權「移到蔣經國的手裡」。<sup>16</sup>

由此皆可看出，傅正對蔣經國／國民黨當局的若干言論和作風，有愈來愈多的反省與批判，對蔣經國的態度也逐漸「由熱望而變成絕望」。<sup>17</sup> 就在此時，傅正的日記裡就不時出現要「剷除」他（按：指蔣經國）<sup>18</sup>、「打倒他」<sup>19</sup> 的記載，甚至還痛罵蔣經國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sup>20</sup> 1952年10月26日的日記裡還寫到：「我決定從今天起我要……把蔣經國的一切罪惡寫下來，等到機會再公諸於

11 「傅正日記」(1951.02.25)。

12 「傅正日記」(1951.02.25)。

13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頁149，傅正註。

14 「傅正日記」(1951.05.22)。

15 「傅正日記」(1951.05.22)。

16 「傅正日記」(1952.0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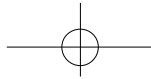
17 「傅正日記」(1952.05.26)。

18 「傅正日記」(1952.05.26)。

19 「傅正日記」(1952.06.02)。

20 「傅正日記」(1952.10.22)。





世，……使世人認識蔣氏的真面目。」<sup>21</sup>

1952 年 11 月 4 日，心情苦悶的傅正決定寫一篇〈我控訴、我呼籲〉的文章，「來痛斥蔣經國的奴役青年和摧殘青年」，並「設法團結中國青年」組成一個「中國青年大同盟」。<sup>22</sup> 隔天的日記裡他寫下了一長篇〈中國青年大同盟宣言〉（草稿），當中痛批蔣介石和他的爪牙們，「都是當代的政治販子和青年販子」。<sup>23</sup>

1953 年夏，傅正更由於不滿蔣經國主持的政戰系統對胡適強調言論自由的演講發動所謂「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之論戰，於是用本名寫了一篇反對所謂國家自由的文章〈個人自由乎？國家自由乎？〉，<sup>24</sup> 寄到《自由中國》半月刊，「向包括蔣經國先生在內的論調公開挑戰」。<sup>25</sup>

由此可見，最遲在 1951 年初，傅正已漸對蔣經國／國民黨當局感到不滿，不過當時傅正還是決定：「為了要達到反共抗俄的當前的主要目的，只有把希望暫時寄托在中國國民黨。」<sup>26</sup> 然而，對一位熱血青年如傅正者，與自己眼中的邪惡勢力妥協勢必會造成內心的痛苦，而且這種痛苦勢必與日俱增。1953 年 1 月 6 日的日記當中，傅正痛苦地寫道：「我想到自己也做了蔣經國的工具，變成了他的犧牲品，很感痛苦，但現在又沒法解脫，真使人更加難受。」<sup>27</sup> 到後來終於決定「想盡一切辦法，離開政工幹校，脫下軍裝」。<sup>28</sup> 特別在 1953 年 9 月 16 日，他的那篇〈個人自由乎？國家自由乎？〉在《自由

.....  
<sup>21</sup> 「傅正日記」（1952.10.26）。

<sup>22</sup> 「傅正日記」（1952.11.04）。

<sup>23</sup> 「傅正日記」（1952.1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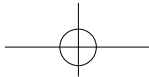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sup>24</sup> 傅中梅（傅正）：〈個人自由乎？國家自由乎？〉，《自由中國》，9：6（1953 年 9 月 16 日）。這篇文章是傅正（傅中梅）發表在《自由中國》的第一篇文章。

<sup>25</sup> 傅正：〈從蔣經國到雷震之路！一叫我如何不想他〉，頁 354-355。

<sup>26</sup> 「傅正日記」（1951.02.25）。

<sup>27</sup> 「傅正日記」（1953.01.06）。

<sup>28</sup> 「傅正日記」（1953.06.05）。



中國》發表之後，政工幹校當局對他進行調查，他「自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絕不能再在只講革命而不知民主的革命學校待下去，寧可冒坐牢的危險也要離開」。29 1953 年 12 月底，傅正毅然決然離開政工幹校，終於「跟蔣經國先生分道揚鑣」。30

離開政工幹校之後，1955 年 2 月傅正插班臺灣大學政治系（1955 年 2 月 - 1957 年 7 月），繼續未竟之學業。31 就讀臺大期間，傅正偶爾在《自由中國》發表文章，1956 年 10 月 1 日赴該社領取稿費時第一次見到雷震，他說：「沒想到竟然一見如故，注定我正式開始走雷先生的路。」32 1957 年 7 月臺大畢業，不久進新竹關西中學任教。1958 年 4 月離開該校，旋即加入《自由中國》社，進一步從「作者」成為「編者」。

### 三、《自由中國》的作者

1949 年，當國民黨當局在內戰中失利、政權風雨飄搖之際，胡適、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在上海聚會，大家「主張辦個刊物，宣傳自由與民主，用以對抗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政治，以之挽救人心」。33 幾個月後，雷震等人隨當局來到臺灣，遂於 1949 年 11 月 20 日在臺灣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一直到 1960 年 9 月 1 日停刊為止，這份刊物是臺灣主張民主自由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有其獨特而不可抹滅的地位。34

29 傅正：〈從蔣經國到雷震之路！—叫我如何不想他〉，頁 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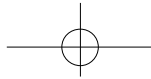
30 傅正：〈從蔣經國到雷震之路！—叫我如何不想他〉，頁 355-356。

31 〈傅正先生事略〉，頁 374。

32 傅正：〈從蔣經國到雷震之路！—叫我如何不想他〉，頁 356-357。

33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 年），頁 58-59。

34 薛化元：〈《自由中國》民主憲政史料的歷史意義〉，《臺灣史料研究》，8（1996 年 8 月），頁 123。



而這份刊物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歷史地位，原因甚多。除了有大量讀者的閱讀與傳播之外，該刊的作者與編者更是居功厥偉。準此而論，對該刊而言，由「讀者」進而成為「作者」與「編者」的傅正，其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不可忽略。

傅正作為《自由中國》的作者，其所發表過的文章約有 66 篇，為數頗多，且經常在該刊（特別是後期）若干議論當中扮演不可忽略的角色。他的文章所發揮的影響力，也可從當時統治當局的激烈反應略窺一二。<sup>35</sup> 特別是雷震案被下獄的四人當中，純粹因為發表在《自由中國》的文章而買禍者，唯有傅正一人（詳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傅正眾多文章中，要以批判「救國團」與「蔣介石三連任」，以及主張「反對黨」應結合地方選舉勢力的相關文章，特別具有歷史意義。

### ※批判「救國團」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以下簡稱「救國團」）成立於 1952 年 10 月，由蔣經國擔任團主任。<sup>36</sup> 學者指出：救國團是「國民黨在校內實施黨化教育的一支主要力量」，<sup>37</sup> 以及國民黨政府用來滲透校園的組織。<sup>3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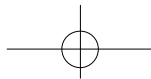
該團成立之初，《自由中國》就開始刊登相關的論述文章。然而直到 1957 年底為止，「《自由中國》的文章中並未質疑救國團的存

.....  
<sup>35</sup> 參見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頁 1-188。

<sup>36</sup> 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 I（1945-1965）》（臺北：國家政策資料研究中心，1990 年），頁 172。

<sup>37</sup>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年），頁 280。

<sup>38</sup>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 年），頁 127。



在問題，而僅僅主張改造救國團」，而「首次公開主張撤消救國團的言論，要等到1958年1月1日出版的社論〈「今日的問題」之（十二）：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sup>39</sup>中才出現」，<sup>40</sup>而傅正則是這篇社論的執筆者。1958年6月傅正再撰社論〈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sup>41</sup>1960年9月1日又撰社論〈三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sup>42</sup>要求撤銷救國團的立場始終一貫。

由此可見，傅正這些文章對《自由中國》批判救國團的發展史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傅正個人的生命史而言，更是他從「蔣經國之路」到「雷震之路」的具體展現。

### ※批判「蔣介石三連任」

1960年，蔣介石兩任總統任期屆滿，依憲法規定不得再連任，然當局最後仍逐漸透過大法官解釋以及修改臨時條款等手段，使蔣介石得以三連任。<sup>43</sup>

在這過程中，許多刊物一再反對修改憲法，並建議蔣介石不可違憲連任。其中，特別是《自由中國》，更在一年四個月內共發表有關社論11篇、專論20篇以及通訊7篇加以反對，篇幅之多，超過該刊所討論過的任何事件。<sup>44</sup>而傅正更是對此一問題至少發表過十多篇文

39 社論（傅正）：〈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自由中國》，18：1（1958年1月1日），頁5-7。

40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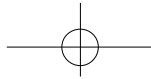
41 社論（傅正）：〈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自由中國》，18：11（1958年6月1日），頁335-338。

42 社論（傅正）：〈三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自由中國》，23：5（1960年9月1日）。

43 詳見薛化元：《臺灣開發史》（臺北：三民書局，2003年），頁173。

44 傅正：〈種籽發芽了！—雷震案的歷史意義〉，《自立晚報》，1988年10月13日。轉引自傅正：《傅正文選》（臺北：作者自印，1989年），頁368。





章，數量之多，幾乎無人能及。

其實，早在 1958 年 5 月傅正就擬寫〈最佳時機〉的短評，間接表達反對蔣修憲三連任。<sup>45</sup>無獨有偶，1959 年 1 月，他又擬寫一篇〈修憲與勸進〉的短評，藉古諷今。<sup>46</sup>1959 年 1 月 4 日，蔣經國發表一篇〈我們是為勝利而生的！〉的文章，傅正從文中「老人與海」的隱喻、配合當時若干政治跡象，嗅出蔣氏父子可能推動修憲連任，遂成一文，刊登在 2 月 16 日的《自由中國》。<sup>47</sup>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是《自由中國》反對三連任的眾多文章中，最早表達對蔣可能三連任疑慮的文章之一。<sup>48</sup>而直到三個月後，胡適和蔣勻田仍相信蔣介石不會推動三連任。<sup>49</sup>

此後，隨著蔣介石企圖三連任的跡象愈來愈明顯，傅正反對的文章也就愈寫愈多。日後，他也因這段期間發表在《自由中國》的兩篇「反蔣三連任」的文章而入獄（詳後）。

### ※主張「反對黨」應結合地方選舉勢力<sup>50</sup>

關於雷震所主導的《自由中國》，其「反對黨」主張的形成與發展，薛化元曾指出：「在形成新的『反對黨』對當時臺灣有其必要性

45 「傅正日記」（1958.0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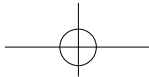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46 「傅正日記」（1959.01.09）。

47 方望思（傅正）：〈請看香港發出的臺灣政治颱風警報〉，《自由中國》，20：4（1959 年 2 月 16 日），頁 19。這段經過可參見「雷震日記」（1959.05.20）傅正註，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頁 92。

48 稍早《自由中國》已刊登一篇社論〈〈欣幸中的疑慮——關於蔣總統反對修憲的聲明〉〉，《自由中國》，20：1（1959 年 1 月 1 日），頁 7）表達疑慮，但不及傅正此文之明顯。

49 「雷震日記」（1959.05.20），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頁 92。

50 在 1950-60 年代，由於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被凍結，形成「萬年國會」，導致人民無法透過選舉來參與中央政治。因此，「本省」籍民主人士不得已只能「側重地方選舉」，藉地方政治舞台以宣揚民主理念，並非他們原先只想侷限在「地方」。筆者按：上述意見，要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供。



的共識以後，《自由中國》對反對黨的組成方式及其功能的看法，基本上仍可分為兩個不同的面向在發展：其一是期望由中國大陸來臺的民主自由人士出面組織，由胡適領導的反對黨；另一個面向則是由地方選舉所帶引出的反對黨主張。」<sup>51</sup>

相較之下，「前者在《自由中國》很早就出現了」，而「《自由中國》的反對黨主張在早期卻完全排除與地方選舉的關係」。<sup>52</sup>一直要到 1957 年，《自由中國》才「第一次使其反對黨主張與地方選舉發生關係，並將臺灣本土政治人物納入反對黨的思考」。<sup>53</sup>當檢討該年舉辦的地方選舉時，傅正即已指出：

經過這次的教訓，無論是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都該深深警惕。要知道國民黨的競選技巧與手段，已經是越來越高明了。……為今之計，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按：以「本省籍」政治人士為主），實在該面對現實政治環境，進行大團結；而如何化解歧見、結成一個強大的反對黨組織，似乎尤有必要。<sup>54</sup>

在《自由中國》鼓吹反對黨的人士當中，傅正最先指出要結合地方選舉與臺灣本土政治人物，然當時此一構想仍與雷震等人推動的反對黨理念卻有相當的差距。<sup>55</sup>不過，傅正此一呼籲在最初雖未受到重視，但日後反對黨的籌組，卻是朝向此時傅正主張的方向來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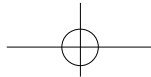
51 薛化元，〈《自由中國》「反對黨」主張的歷史考察〉《臺灣風物》，45：4（1995年12月），頁11-12。

52 薛化元：〈《自由中國》「反對黨」主張的歷史考察〉，頁12、21。

53 薛化元：〈《自由中國》「反對黨」主張的歷史考察〉，頁22。

54 傅正：〈對本屆地方選舉的檢討〉，《自由中國》，16：9（1957年5月1日），頁13。

55 因為此時「包含雷震的這群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心目中推動的反對黨，並不是以地方選舉為核心的政黨，也不是以臺籍政治人物為核心的政黨，在此一時刻至少雷震對一個單純以地方選舉為核心的政黨是為頗具戒心的。因為實際參與地方選舉的主要正是臺灣本土的政治人物，而來自中國大陸主張自由民主的政治菁英，縱然投入此一舞臺，囿於主客觀的條件，難以成為主要的力量」。薛化元：〈《自由中國》「反對黨」主張的歷史考察〉，頁25。



對《自由中國》而言，這是其「反對黨思維」與「地方選舉」連結的開始；對傅正個人而言，其日後的民主志業，更是朝此一大方向來發展，極具里程碑的意義。

#### 四、《自由中國》的編者

1958 年 4 月開始，傅正受雷震之邀，正式成為《自由中國》的編輯。《自由中國》從此時到結束將近兩年半的時間，實際負責主編工作的傅正，<sup>56</sup>也就成了該刊除雷震以外的另一位靈魂人物。

平時傅正除了一般編輯工作（如定期赴印書館清校等等）之外，還需撰寫大量的稿件，這其中包括社論與一般性文章以及短評（傅正建議開闢的專欄）。有時候還需代雷震寫文章，或幫同仁找資料，甚至常要設法避免登出的文章發生法律問題。另外，這段時期由於他和「本省」籍政治菁英接觸日廣，也就經常幫忙這些政治菁英修改稿件、甚至議會質詢稿。<sup>57</sup>此外傅正還常在社裡陪各路訪客聊天，其中常有來要求「申冤」者。更棘手的是，他不時還要面對統治當局的壓力，有時候還得應付可能是特務們所設的圈套。<sup>5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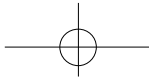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這段期間，從「反對蔣介石三連任」以及「1960 年的地方選舉」相關文章的處理，即看出傅正作為該社編者的重要性。

關於《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的過程以及傅正相關文章的特色，筆者上一節已詳述。而作為《自由中國》的「編者」，

.....  
<sup>56</sup> 傅正：〈對殷海光先生的一段懷念〉，收入林正弘主編：《殷海光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頁277。

<sup>57</sup> 如幫楊金虎修改〈建設臺灣模範省〉的稿子，見「傅正日記」（1958.04.03）、幫郭雨新修改他即將在省議會提出的總質詢稿，見「傅正日記」（1960.08.17）。

<sup>58</sup> 「雷震日記」（1960.04.04）、（1960.04.06），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頁283-285；「傅正日記」（1960.04.04）、（1960.04.05）。



傅正在這過程中亦扮演著頗為積極的角色。例如，他在 1960 年 1 月 16 日的日記上提到：

今天，我們在開編輯會議時，我認為直到第三任總統選出為止，每一期都該對修憲連任問題，正面表示意見。……我們便該趁勢掀起一個高潮，並盡最大努力去找幾位知名人士，繼續寫這種文章在我們的雜誌上發表。最後，大家都贊成我的意見。<sup>59</sup>

由此可見，不論作為「作者」或「編者」，傅正皆對「反蔣三連任」的問題表現出高度的積極作為。

另外，1960 年 3 月 21 日蔣介石連任總統之後，由於省議員暨縣市長選舉將在 4 月 24 日舉行，於是，《自由中國》與執政者對立的焦點也逐漸從修憲三連任問題轉移到地方選舉問題上。<sup>60</sup>此時傅正眼見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連一點臨時宣傳的機會都沒有」，而認為《自由中國》「應該挺身而出，給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壯壯聲勢」。因此，他向雷震建議出版《臺灣地方自治與選舉的檢討》（民、青兩黨與臺籍地方人士的文章彙編，約 30 篇、14 萬字），援助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而「他（按：指雷震）起初還不大同意，最主要的是怕沒有銷路。但據我（按：指傅正）的分析，這事不至於有太多問題，所以他也就欣然贊同」。<sup>61</sup>

3 月底，傅正收到臺中縣長參選人王地寄來的限時信，王地要求傅正「在輿論上加以支持」。於是，傅正決定在選前 4 月 16 日出版的《自由中國》上面，「給在野黨及無黨無派候選人做一次最後的輿論支持」。<sup>62</sup>果然，該期就登出 10 篇左右與地方選舉相關的文章，除了何春木、楊基振等「本省」籍地方人士的文章以及民社黨的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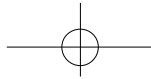
59 「傅正日記」（1960.01.16）。

60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 169。

61 「傅正日記」（1960.03.05）、（1960.03.19）。雷震在其日記中也提過此事，見「雷震日記」（1960.03.15），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頁 270。

62 「傅正日記」（1960.03.29）。





明，傅正一人就寫了 4 篇相關的文章，<sup>63</sup> 對支援在野黨及無黨無派候選人選舉不遺餘力，其對民主政治的熱情可見一斑。

日後傅正指出：「（我）遠在 1954 年便開始寫批評地方選舉的文章，1958 年負責『自由中國』半月刊編務後，有關地方選舉方面的社論，幾乎全由我一人執筆。」<sup>64</sup> 從作為《自由中國》的「作者」到「編者」，傅正皆對地方選舉表現出頗為高度的關注。此一關注，更對日後傅正組黨志業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詳後）。

## 五、籌組「中國民主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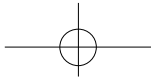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是臺灣戰後首度大規模組織反對黨的運動，參與者包含從事地方選舉的「本省籍」政治人物，以及《自由中國》半月刊為核心的「外省籍」知識分子。他們分別歷經多年的努力，並在 1950 年代後期逐漸合流，進而蘊釀出反對黨的氣勢。在 1960 年地方選舉結束之後召開的選後檢討會上正式宣布開始籌組反對黨。然在即將籌組完成前不久，同年 9 月 4 日卻爆發組黨領袖雷震等人遭統治當局逮捕的事件（史稱「雷震案」或「雷案」），使得整個組黨運動的氣勢急轉直下，翌年地方選舉之後，終至胎死腹中。

就傅正個人而言，最遲在 1951 年就已期盼加入另一政黨（當時他還是國民黨員），<sup>65</sup> 之後成為《自由中國》社的一份子，繼而跟隨雷震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黨」。不久「雷震案」爆發，他也隨之

.....  
<sup>63</sup> 傅正的文章計有：〈請投在野黨和無黨無派候選人一票！〉、〈國民黨豈可重演違法競選的故技？〉、〈人心！人心！人心！一從臺中縣、臺南市、雲林縣事例說到唐秘書長和田部長的談話〉以及〈看臺灣各縣市群雄角逐！一關於全省二十一縣市選局報導〉，皆刊載於《自由中國》，22：8（1960 年 4 月 6 日）。

<sup>64</sup> 傅正：〈請支持我為民主而戰！一寫在「開火」、「挑戰」、「戰鬥」三本文選前面〉，收入傅正：《傅正文選》（臺北：作者自印，1989 年），頁 24。

<sup>65</sup> 「傅正日記」（1951.02.25）。



入獄。然已將組黨作為一種志業的他，並不因此而放棄組黨的理想，26年後終於參與組成民主進步黨。因此，要瞭解傅正一生的組黨志業，必須從「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開始瞭解。

### ※連結兩個組黨脈絡

近百年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其理念與主張有兩條主要脈絡：一條是日治時期臺灣政治抗爭的「縱向傳承」，另一條則是「五四」以降中國自由主義的「橫向移植」。<sup>66</sup>從1950年代開始鼓吹、1960年開始籌組，一直到1961年才正式結束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事實上即是上述兩條脈絡的交錯推衍：前者是側重「地方選舉的脈絡」（以從事地方選舉的「本省籍」政治人物為主），後者則是側重「思想啟發的脈絡」（以《自由中國》半月刊為核心的「外省籍」知識分子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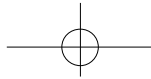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代後期，當組黨運動逐漸展開之際，之前長期鼓吹組黨的《自由中國》集團竟出現「鼓吹者眾而參與者寡」的現象。<sup>67</sup>若非雷震決定與從事地方選舉的政治人物合作組黨，<sup>68</sup>該集團對整個1950年代以降的組黨運動將僅具思想啟發的意義，這兩條組黨運動的脈絡極可能成為兩條「平行線」。

更重要的是，在雷震連結這兩個脈絡的過程當中，傅正扮演頗為重要的角色。前面已提過，作為一位「作者」，傅正是第一位使《自由中國》的反對黨主張與地方選舉發生關係、並將臺灣本土政治人物納入反對黨思考的關鍵人物。而作為一位「編者」，傅正也大力支援臺灣本土政治人物參與地方選舉乃至組黨運動。在以下的歷史發展過

.....  
<sup>66</sup> 蘇瑞鏘：〈評介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3（2002年3月），頁172。

<sup>67</sup> 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頁91-103。

<sup>68</sup> 過程詳見謝漢儒：《早期臺灣民主運動與雷震紀事——為歷史留見證》（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頁114-230。



程中，吾人可以一再看到傅正在連結兩個組黨脈絡過程中的重要性。

### ※組黨運動中的「非胡適取向」

以雷震為首的《自由中國》集團，長久以來一直殷切地期盼胡適能出面領導組黨運動。<sup>69</sup>然而，胡適對該組黨運動的基調一直是「支持但不領導」，乃至該「黨」正式開始籌組時，他的態度依舊如此。<sup>70</sup>

不過，相較於雷震等人，本身即屬該集團一份子的傅正似乎很早就清楚胡適的基調。例如，1958年4月8日胡適回臺，稍談到組黨問題，翌日傅正在日記上就指出：「胡先生……他之不可能出來組織反對黨，是我早就料定了的。」<sup>71</sup>11月18日的日記當中更清楚地表示：有志於以反對黨救國的人士，應該離開胡適而另做新的打算。<sup>72</sup>1959年1月30日，傅正向雷震表示：「把組織反對黨的希望放在他（按：指胡適）身上，便一定會落空。」<sup>73</sup>

從日後胡適終究不願意出面領導組黨運動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出當年傅正先覺者的角色。

### ※鼓吹並參與組黨運動

關於組黨運動的鼓吹，《自由中國》集團曾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到了1960年5月18日正式進入籌組階段，卻出現「鼓吹者眾而參與者寡」的現象。例如，整個《自由中國》社只有雷震與傅正少數幾位公開積極參加。<sup>74</sup>另外，在鼓吹階段，雷震極力拉攏了一些國民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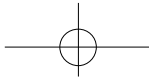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69 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頁247-264。

70 1960年8月1日 *China News* 和 *China Post* 的報導。轉引自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60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頁3332。

71 「傅正日記」（1958.04.09）。

72 「傅正日記」（1958.11.18）。

73 「傅正日記」（1958.01.30）。



和民、青兩黨熱衷反對黨的人士，然最後積極參與組黨而比較具有代表性者，也只有齊世英、夏濤聲、楊毓滋、謝漢儒等寥寥數位。

雷震與傅正參與組黨以後，《自由中國》社的同仁雖也樂見反對黨的組成，但仍和實際的組黨活動保持一定的距離。《自由中國》社的同仁中，「除了傅正兄當時對『反對黨運動』的興趣，比較濃厚，完全介入外，其他的編委，大多置身事外，且不願把『籌組反對黨』的事，和『自由中國』雜誌扯在一起」。<sup>75</sup>然傅正卻認為：

《自由中國》半月刊鼓吹反對黨十年多，而我們自己也一向堅決主張臺灣必須有一強大反對黨，現在既有這樣一個機會，我們為什麼不盡力一試？中國知識份子的最大毛病，就是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難道我們也應該這樣？<sup>76</sup>

因此，傅正與雷震是《自由中國》社裡極少數既「鼓吹」也「參與」組黨運動者。

### ※超越「省籍」的藩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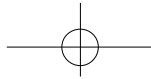
1950年代後期開始，隨著地方選舉的舉行，組黨運動逐漸進入實踐階段，臺灣地方政治人物參與組黨活動者亦日漸增多。如此一來，卻使得有些「外省籍」民主人士開始憂心「本省籍」政治勢力的興起、新政黨會變成「臺灣人的黨」。在雷震看來，「內地人在潛意識裏，是恐懼新黨成立之後，本省人在政治上占了優勢，內地人可能要吃虧」。<sup>77</sup>1950年代原先鼓吹（至少贊同）反對黨的「外省籍」民主人士當中，有些人的確有這種憂心。<sup>78</sup>

74 傅正：〈《自由中國》的時代意義〉，收入澄社主編：《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年），頁367；胡虛一：〈讀「愛荷華憶雷震」書後〉，收入李敖編著：《雷震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頁160。

75 胡虛一：〈讀「愛荷華憶雷震」書後〉，頁169。

76 「雷震日記」（1960.05.20），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頁312，傅正註。





然而，傅正與若干「外省」籍民主人士（如雷震）最後還是超越了「省籍」的藩籬，而與「本省」籍政治人物一同參與反對黨的籌組。誠如張忠棟指出：「一些早期為反共而爭取民主自由的人，看到地方力量興起，便開始猶豫退縮，甚至放棄爭民主爭自由的事業。唯有雷震和傅正，他們可以兼跨不同的時代，打破省籍的隔閡。」<sup>79</sup>

### ※用「激將法」刺激雷震參與組黨

前面討論過，在正式決定組黨之後，出現不少「鼓吹」卻不「參與」的現象，這種現象也差一點發生在雷震身上。傅正晚年在主編《雷震全集》、注解雷震日記時曾指出：

在 5 月 18 日選舉檢討會決議組黨後，由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編輯委員有不同意見，而蔣勾田又有十分情緒性反應，使得雷先生受到相當困擾。因此，雷先生就問我的意見。

我坦白表示，……《自由中國》半月刊鼓吹反對黨十年多，而我們自己也一向堅決主張臺灣必須有一強大反對黨，現在既有這樣一個機會，我們為什麼不盡力一試？

這就是後來雷先生說我的激將法刺激了他！<sup>8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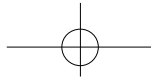
對《自由中國》社而言，傅正不只鼓吹組黨，也參與組黨，而且更進一步用「激將法」刺激對參與組黨已有幾分踟躕的雷震。傅

77 張健生：〈訪雷震·談新黨〉，《公論報》，1960年8月24日，版2。

78 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頁93-96。

79 張忠棟：〈永遠活在眾人心中心〉，收入張忠棟：《自由主義人物》（臺北：允晨文化，1998年），頁123。

80 「雷震日記」（1960.05.20），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頁312，傅正註。在另一段「雷震日記」的註解當中，傅正也寫到：「等到雷先生在十年前去世以後，我在整理他的遺稿中發現：他的積極領導組織中國民主黨，也受了我的激將法的刺激。」見「雷震日記」（1960.03.16），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頁271-272，傅正註。



正這臨門一「激」，使雷震得以順利跨越從「鼓吹者」到「參與者」之間的障礙，對該運動而言，意義十分深遠。

### ※組黨運動中不可忽略的「檯面下角色」

從1960年5月18日決議組黨開始，反對黨的籌組活動即積極地展開。在這過程中，有許多人參與了組黨的工作，然日後吾人多半只記得少數「檯面上」的領導分子。若干「檯面下」對組黨有相當貢獻和影響的人士，卻往往被忽略，傅正正是這種被忽略的「檯面下」人士。

傅正當時的身分是「選改會」的祕書，同時又兼任「選改會」三大委員會當中的「組織委員會」祕書以及「宣傳委員會」祕書，<sup>81</sup>稍後進而成為「中國民主黨」的籌備委員兼祕書。<sup>82</sup>這段期間，他「負責幾乎所有文稿的起草乃至各地座談會的部署」。<sup>83</sup>

在「文稿的起草」方面，傅正負責「當時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的文字，包括招待記者的稿子」。<sup>84</sup>至於「各地座談會的部署」方面，從7月19日至8月13日間，該會在臺中、嘉義、高雄、中壢等地舉行「分區巡迴座談會」，試圖深入群眾。在這段期間，傅正也扮演著不可被忽視的角色。除了雷震日記，<sup>85</sup>從謝漢儒（當時組黨召集人之一）的回憶錄，<sup>86</sup>都可看出傅正的重要性。

這些起草文稿和接洽聯絡的「檯面下」工作經驗，看起來瑣瑣碎碎，或許卑之無甚高論，但卻是二十多年後傅正參與籌組民主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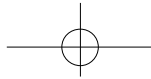
.....  
<sup>81</sup> 傅正：〈團結、組黨、爭民主—為紀念郭雨新先生逝世一週年而寫〉，收入郭惠娜、林衡哲編：《郭雨新紀念文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頁90。

<sup>82</sup> 傅正：〈憑什麼將我連續兩次感化？一對國民黨的一點公開控訴〉，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頁877。

<sup>83</sup> 傅正：〈從蔣經國到雷震之路！—叫我如何不想他〉，頁361。

<sup>84</sup> 〈政黨政治的催生者：傅正—《中國先驅》創刊號專訪〉，《中國先驅》，1（1987年3月），轉引自傅正：《傅正文選》，頁229。

<sup>85</sup> 例如：「雷震日記」（1960.07.13）。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頁348。



黨時不可或缺的重要經驗。<sup>87</sup>

## 六、政治黑牢

就在組黨活動進入高潮而準備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之際，1960年9月4日上午，警總以「涉嫌叛亂」為由，拘捕了《自由中國》的發行人雷震、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驩以及離職職員劉子英（時任職國史館）等4人，<sup>88</sup>史稱「雷震案」或「雷案」。10月3日，軍事合議庭公開審訊，當日審結。10月8日，警總高等軍事審判庭宣判，其中，傅正被裁定感化三年。<sup>89</sup>

就傅正來看被交付感化之理由，乃是因為他曾在《自由中國》撰刊〈護憲乎？毀憲乎？一望國大代表作明智的抉擇！〉，被控「意圖以文字方式強使國大代表貫徹其意見」。又撰刊〈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被控「妄指大法官為御用之工具，曲解大法官會議，依權責所為國大代表總額問題之解釋」。軍事檢察官「認其內容超越學術研究，意見討論之範圍，係挑撥分化，破壞法統，阻撓國民大會集會，與匪之統戰策略相呼應，便利匪幫之叫囂」，<sup>90</sup>以此被交付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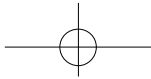
然而，〈護憲乎？毀憲乎？一望國大代表作明智的抉擇！〉一文，旨在希望國大代表能「粉碎修憲連任運動的企圖，而擔負起『護

86 謝漢儒：《早期臺灣民主運動與雷震紀事—為歷史留見證》，頁275-302。

87 筆者面訪陳信傑先生時，陳先生一再強調傅正當時雖是「檯面下」人物，但從工作當中所獲得的實際經驗，卻對他晚年籌組民進黨有很大的助益。例如晚年祕密串聯組黨人士的經驗，即傳承自早年的組黨經驗。關於傅正兩次組黨經驗傳承，目前最權威的研究成果乃是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109-126。

88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呈報國防部已依法將雷震等人逮捕到案〉，收入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頁191；《中央日報》，1960年9月5日，版1。

89 《中央日報》，1960年10月9日，版3。



憲』的責任」。<sup>91</sup> 至於〈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一文，旨在批判大法官會議通過關於國民大會代表總額的解釋案，使國民大會能順利地召開，便於修憲連任之進行。<sup>92</sup> 二文之要旨，乃傅正透過呼籲民意代表以及評論大法官解釋之方式，反對當時的修憲連任運動，實不應過度推論，而入他於罪。另外，當年公開撰文反對蔣介石三連任者甚多，非獨傅正一人，然獨他因反對蔣介石三連任而獲罪，實難看出司法的準繩何在。

1963 年，傅正感化三年屆滿，依「戡亂時期匪諜交付感化辦法」第 15 條規定：「受感化人於感化期間屆滿時，應即釋放。」然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卻又以傅正「於感訓期間，拒不接受教育，思想傾匪如故，且迭次發表反動荒謬言論」為由，聲請並裁定將他再度感化，<sup>93</sup>「並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全面隔離，禁止接見、通信、閱讀達二年之久，以報先生當年拒絕與官方合作之舊恨」。<sup>94</sup> 直到 1966 年 12 月 21 日，傅正才恢復自由。

## 七、作育英才

出獄之後，傅正任職大專學校，仍不忘鼓吹民主。1967 年，他應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之聘，講授世界近代史。他講啟蒙運動、宗教改革、特別是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他說這「還是為了民主」。1972 年，復應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之邀，至該校政治系任教。直到

90 《中央日報》，1960 年 10 月 9 日，版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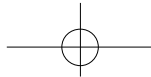
91 傅正：〈護憲乎？毀憲乎？—望國大代表作明智的抉擇！〉，《自由中國》，22：4（1960 年 2 月 16 日），頁 114-116。

92 社論（傅正）：〈護憲乎？毀憲乎？—望國大代表作明智的抉擇！〉，《自由中國》，22：5（1960 年 3 月 1 日），頁 144-146。

93 警總聲請書與裁定書，轉引自傅正：《傅正文選》，頁 145-151。

94 〈傅正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七輯》，頁 375。





去世前，先後講授中國政府、行政法、中國政治學名著選讀、中國憲法與政府、地方政府、中國近代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他說這「更是為了民主」。<sup>95</sup>

在這段執教杏壇期間，傅正廣受同事的好評。例如，他在東吳政治系的同事黃爾璇指出，傅正「對同事謙和誠懇，對學生循循善誘，親切關愛，講課認真淹博，不作違心之論，故深為門牆桃李所尊敬」；<sup>96</sup> 徐振國則強調，傅正「執著而寬和的個性，勇於批判而不流於激情的態度」，特別值得珍惜和重視；<sup>97</sup> 黃昭弘則認為，傅正在東吳「課都排在第一堂，第一堂上課而十八年從不遲到」，<sup>98</sup> 對其敬業精神印象特別深刻。

此外，傅正也深受學生的愛戴。例如，他在東吳政治系的學生陳信傑指出：「傅老師除了學識淵博令學生喜愛外，尤其是他高尚的人格，對我們的影響實在很大很大。」<sup>99</sup>

另外，在課堂上，傅正有其感情豐沛的一面，亦有其理性自制的一面。據他的學生翁初美回憶，他在「講授中國近代政治史、三十八年撤退、屍首遍野，甚至百年前清末辱國割地賠款，都是熱淚盈眶」。<sup>100</sup> 而他在世新專校的學生陳菊則回憶指出，傅正當年上中國近代史時，「對近代史上若干政權的腐敗醜陋，老師一一抨擊臧否，但對現實政情絕口不提」。日後在陳菊看來，在恐怖年代遭受過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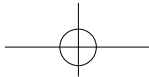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95 傅正：〈請支持我為民主而戰！—寫在「開火」、「挑戰」、「戰鬥」三本文選前面〉，收入傅正：《傅正文選》，頁 21；陳正茂，〈民國人物小傳—傅正〉，《傳記文學》，81：5（2002 年 11 月），頁 145。

96 黃爾璇：〈憶念與傅正先生共事的一段雪泥鴻爪〉，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 年），頁 35。

97 徐振國：〈敬悼傅正老師——一位堅韌寬和的當代自由主義者〉，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頁 125。

98 黃昭弘：〈悼念傅正老師〉，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頁 120。

99 轉引自王美琇：〈他已莊嚴地走入臺灣史—記傅正先生為民主而戰的一生〉，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頁 110。



的傅正，「小心沉默正是對現實政治不同形式的抗議」。<sup>101</sup>

然而，「小心沉默」只是傅正面對專制政權一時權宜的自制態度，對民主政治滿懷熱情的他，仍在等待重新出發的時機。

## 八、籌組「民主進步黨」

1979年是傅正民主志業重新出發的一年。這年3月7日雷震過世後，傅正覺得後死者的責任太大，必須盡全力走民主之路。<sup>102</sup>10個月後的12月10日，臺灣爆發美麗島事件，傅正認為黨外菁英平白犧牲太可惜，他向康寧祥強調必須收拾殘局、重整旗鼓。<sup>103</sup>

而後經過1980年與1983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結果，儘管黨外皆有相當的斬獲，然而傅正認為還是必須組黨才有希望跟國民黨對抗。<sup>104</sup>也就是說，在傅正看來，要走民主之路就必須組織一個真正的反對黨。

而後傅正開始與其他民主志士有過多次嘗試，其中比較重要的是1985年底到1986年初的祕密串聯，可惜在詭譎的政治高氣壓下，祕密串聯的工作無法持續下去。<sup>105</sup>

到了1986年6月，傅正在立法委員費希平的邀請下，再度出面奔走，並與黃爾璇教授商量後，擬定了組黨小組的名單。之後傅正就以這名單分別拜訪說明，並徵求同意。後來傅正商得國大代表周清玉的同意，借用她在臺北市忠孝東路的家裡開會。<sup>106</sup>該年7月3日，由傅

.....  
<sup>100</sup> 翁初美：〈我想念我的老師—傅正先生〉，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頁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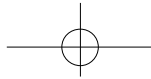
<sup>101</sup> 陳菊：〈用生命實踐理想的人—懷念傅正老師〉，收入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編：《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紀念雷震先生百歲冥誕暨傅正先生逝世五週年》（臺北：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1996年），頁38。

<sup>102</sup> 傅正：〈我為什麼兩次參加組黨？〉，頁15。

<sup>103</sup>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頁103。

<sup>104</sup>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頁125。

<sup>105</sup>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頁125。



正請被邀者在周清玉家對面的御龍園餐廳吃飯，飯後又回到周清玉家中商談。當晚 10 點左右，由謝長廷提議以民主進步黨為黨名，大家共同決定要籌組政黨。之後組成了建黨十人小組，包括：傅正、費希平、尤清、江鵬堅、張俊雄、周清玉、謝長廷、游錫堃、陳菊、黃爾璇等十人。<sup>107</sup>

而後傅正與尤清、黃爾璇負責宣言、政綱、政策的起草工作，經過兩個多月不斷地集會努力，完成了組黨的初步工作。同年 9 月 28 日，這些民主人士終於在圓山大飯店成立民主進步黨。<sup>108</sup>

在民主進步黨成立過程中，傅正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他被不少人視為當年祕密組黨過程中無形的召集人。例如，民進黨前主席黃信介曾指出：「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有一個人是不能忘記的，就是傅正先生。在民主進步黨祕密籌備組黨的過程中，先生以一位大陸籍人士，無財無勢，卻因其道德人格及組黨經驗，無形中成了組黨工作小組的召集人，調和各種意見，任勞任怨，才使在高壓中進行的組黨工作順利進行。」<sup>109</sup> 當年同屬創黨十人小組的尤清亦指出，1986 年 7 月初的組黨餐會，是由傅正出面，「後來的幾次集會，他就成了無形中的召集人」。<sup>110</sup>

另外，當時傅正常扮演排難解紛的角色，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就對內而言，當年同屬創黨十人小組的黃爾璇，日後憶念傅正時指出，在組黨過程中，當傅正看到有些人消極不參與時，曾表示：「在臺灣組黨，我們都不怕了，你們還怕什麼？」當遇到成員意見相持不下時，常靠傅正發揮排難解紛的作用。<sup>111</sup> 傅正當年的學生、也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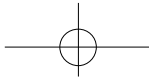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  
<sup>106</sup> 傅正：〈我為什麼兩次參加組黨？〉，頁 15。

<sup>107</sup>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頁 61。

<sup>108</sup> 傅正：〈我為什麼兩次參加組黨？〉，頁 15。

<sup>109</sup> 黃信介：〈終生為民主奮鬥而不悔—追念傅正先生〉，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頁 14-15。

<sup>110</sup> 尤清：〈緬懷臺灣政黨政治的催生者—傅正教授〉，收入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編：《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紀念雷震先生百歲冥誕暨傅正先生逝世五週年》，頁 31。



屬創黨十人小組的陳菊亦指出：「每當在討論的過程中，費希平先生的意見常與我們相左，都是傅老師從中溝通協調使小組超越統獨之爭不至於破裂。」<sup>112</sup>而在宣布組黨前一天的擴大會議上，由於到場的人不夠踴躍，擔任主席的費希平幾次打算拂袖而去，還是由傅正出面苦勸，組黨前夕的最後一次會議才得以順利進行。<sup>113</sup>就對外而言，當年居間協調的中介學者之一胡佛指出：「我們中介學者曾進行兩次政治溝通（一次是黨外公政會危機，一次是民進黨建黨危機），每次皆與傅先生保持密切的聯絡及坦誠的商議，解決了很多的問題，增加許多瞭解。」<sup>114</sup>

再者，許多人對傅正在組黨過程中展現認真的態度、過人的勇氣與非凡的智慧，多給予高度的評價。周清玉則回憶當年在她家中進行的祕密組黨工作，「每週開會，出席最勤勉的，是傅正老師。他每會必到，而且從頭坐到尾，認真參與討論，而且勤於寫筆記」，<sup>115</sup>這是認真的態度。陳菊回憶當年組黨之時風聲鶴唳，小組成員都有坐牢的準備，而在排定被捕的梯次時，傅正自願列為第一批，<sup>116</sup>這是過人的勇氣。胡佛曾盛讚傅正「能審時度勢，對大局具有精確的判斷力」。<sup>117</sup>陳信傑指出：「關於政局的研判，離不開對國民黨政權本質的了解，以及對蔣經國性格的認識」，而「早在 1950 年代初期傅

.....

111 黃爾璇：〈憶念與傅正先生共事的一段雪泥鴻爪〉，頁 38-39。

112 陳菊：〈用生命實踐理想的人—懷念傅正老師〉，頁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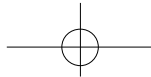
113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頁 115。

114 胡佛：〈民主，民主，還是民主—傅正先生的民主理念與實踐〉，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頁 74。

115 周清玉：〈懷念傅正老師〉，收入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編：《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紀念雷震先生百歲冥誕暨傅正先生逝世五週年》，頁 35。

116 陳菊同時亦指出：當時「老師（按：指傅正）和江鵬堅律師還言，我剛坐牢歸來不宜列進第一梯次，這種同志愛，令我十分感動，也堅信，如此的寬容、愛護和犧牲，性恐落人後的精神是民進黨創建的最大條件」。陳菊，〈讓我心送一程—悼念傅正老師〉，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頁 116。





正對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已有深切的體認」。<sup>118</sup> 這是非凡的智慧。

由以上眾人的回憶，傅正在籌組民主進步黨過程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無怪乎歷史學者張忠棟會認為：「民主進步黨之終底於成，說他（按：指傅正）貢獻最大，絕對不算誇張，許多創黨的黨員大都承認這一事實。」<sup>119</sup>

## 九、最後五年

民進黨籌組成功之後，傅正仍不得閒。他還是積極為爭取民主人權而犧牲奉獻，直到油盡燈枯、而於 1991 年 5 月 10 日因癌症病逝於孫逸仙治癌醫院為止。在他最後將近 5 年（1986-1991）的生命中，傅正主要作為可概分為以下幾類：

### ※擔任黨職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後，傅正一直在中央黨部服務，並歷經中央執行委員、政策中心主任以及顧問等職。每會必準時出席，有文必錄，雅號太史公。創黨初期之若干重要聲明、決議文、對外宣言，大都出自傅正手筆。<sup>12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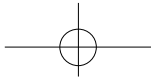
在擔任黨職期間，傅正頗致力於兩岸政策的研究。例如，1988 年，傅正以政策中心主任的身分主辦過「人民有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要不要列入黨綱的問卷調查。<sup>121</sup> 又如，1989 年在「民主進步黨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草案」的研擬過程中，傅正堅持在臺灣具有獨立的國際主權前提下，以「終止臺海兩岸對抗；基於臺灣人民之整體利

117 胡佛：〈民主，民主，還是民主—傅正先生的民主理念與實踐〉，頁 74。

118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頁 119。

119 張忠棟：〈永遠活在眾人心中〉，頁 122。

120 治喪委員會：〈傅正先生事略〉，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頁 9。



益謀求合乎人道、平等、和平的解決途徑」，提出各項具體主張。<sup>122</sup>

### ※鼓吹開放外省人返鄉探親

1987年4月12日，傅正首先在臺北市金華國中抨擊國民黨限制外省人返鄉探親之不人道，並撰寫〈抗議不准返鄉省親的不人道政策〉一文。另外，他也全力支援「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在全臺各地發表多次演講，邀請陶百川等自由派學者擔任顧問，乃至為該會撰寫文稿。<sup>123</sup>例如在1987年9月20日，傅正在〈回家的時候到了一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聲明〉一文中高呼：「想家，是最原始的人性！回家，更是最起碼的人權！」並要求：「我們要回家，我們要求能立刻回家！」<sup>124</sup>五天後行政院長俞國華在立法院正式宣布，政府已準備開放赴中國大陸探親。1988年7月，傅正也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鄉。

### ※發起平反雷震案

1988年4月8日，傅正向監察院陳情，請求徹查雷震案。<sup>125</sup>14日，時任監察委員的雷震夫人宋英，也要求監察院平反雷震案。<sup>126</sup>15日，康寧祥等13名立法委員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要求「從速徹底平反雷震案」。<sup>127</sup>29日，「1960雷震案後援會」成立，積極為平反雷震案奔走。22日，監察院指派謝崑山委員調查，並索回雷震在獄中所寫的回憶錄。7月21日，謝崑山赴國防部及新店軍人監獄調查，軍人監獄卻聲稱已將回憶錄焚毀。該回憶錄史料價值極高，乃近代中國與臺灣相當珍貴

.....  
<sup>121</sup> 傅正：〈「人民有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黨綱座談會說明〉，《民進黨周報（革新版）》，4（1988年4月2日至8日），轉引自傅正：《傅正文選》，頁221-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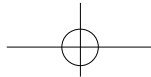
<sup>122</sup> 張俊宏：〈族群和海峽對立的融解者〉，《中國時報》，1991年6月7日，版27。

<sup>123</sup> 傅正：〈請支持我為民主而戰！一寫在「開火」、「挑戰」、「戰鬥」三本文選前面〉，頁22。

<sup>124</sup> 傅正，〈回家的時候到了一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聲明〉，收入傅正：《傅正文選》，頁83。

<sup>125</sup> 陳情書收入傅正：《傅正文選》，頁291-295。

<sup>126</sup> 相關史料詳見傅正：《傅正文選》，頁297-304。



的憲政史、政黨史與政治史料，因此，當它遭當局焚毀的消息傳出，輿論譁然，更引起有識之士的撻伐。<sup>128</sup>

在平反雷震案的過程中，舉凡監察院陳情書、立法院質詢稿、雷震案後援會聲明稿、雷震案後援會抗議書等等，多出自傅正之手。特別是雷震回憶錄被焚一事傳出之日，正當傅正四十年來首次回到故鄉省親之時。聽到焚書的消息後，傅正「只有忍痛終止探親，趕回臺灣」，<sup>129</sup>繼續為平反雷案奮鬥。傅正對平反雷案用心之深、用情之重，由此可見一斑。

### ※主編《雷震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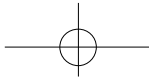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因為有感於雷震回憶錄被焚毀，歷史真相恐將成灰，同時在好友陳宏正的鼓勵下，傅正開始主編《雷震全集》，並為之撰寫多篇序文與詳盡的註解。1989年至1990年間，由桂冠圖書公司陸續出版43冊。不僅直接保存雷震一生重要的著作、日記與書信，同時也間接保存了傅正個人重要的歷史見證與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時，傅正投入了立法委員選舉，他可以說是在百忙之中抽空主編《雷震全集》。

.....  
<sup>127</sup> 這篇質詢稿是由傅正執筆，主要內容包括：i政府必須正視雷震案的政治意義。j雷震案的罪名是蓄意製造出來的。k雷震案的未偵審先定罪的手法是非法的。l雷震案由警備總司令部偵審是非法的。m雷震案的偵審過程也是非法的。n平反雷震案除了還給個人清白外，還代表我們的政治與制度具有反省能力。詳見：〈本院康委員寧祥等十三人，為請從速澈底平反雷震案，以刷清政府於民主憲政史上留下之重大污點，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立法院公報》，77：31（1988年4月16日），頁76；傅正：《傅正文選》，頁305-317。

<sup>128</sup> 詳參馬之驥：《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年），頁430-438；傅正：《傅正文選》，頁291-359；傅正：〈雷震《回憶錄》的歷史意義〉，《當代》，29（1988年9月），頁74-78。陳世宏：〈導論〉，收入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臺北：國史館，2003年），頁5-8。

<sup>129</sup> 傅正：〈傅正「誓為平反雷震案奮鬥到底」〉，收入傅正：《傅正文選》，頁332。



## ※競選立法委員

1989年底，臺灣同時要舉行縣市長以及立法委員的選舉。尤清代表民進黨出馬競選臺北縣長，特別懇請傅正參選臺北縣立法委員。尤清指出：「最主要的一點，實在就是肯定他和敬重他四十年來為民主奮鬥的精神和貢獻。我始終認為：具有他這種特殊政治歷史和政治背景的外省人，假使能經由普選的正常程序進入立法院，對於臺灣的民主，具有特殊意義。」<sup>130</sup>對於參選立委一事，好友胡佛與陳宏正等人亦表支持。傅正表示：「基於愛臺灣的一貫態度，以及愛民主的一貫原則」，決定出馬競選。<sup>131</sup>

選舉結果，傅正雖未能如願當選，然當時為了籌募競選基金而自行出版《對一黨專政開火》、《向蔣家父子挑戰》以及《為中國民主黨・民主進步黨戰鬥》等三冊《傅正文選》，卻也保留傅正一生重要的歷史紀錄，也為臺灣民主發展留下重要的歷史見證。

## 十、除了民主，只有民主

綜觀傅正大半生的歲月，一直在為民主政治而奮鬥。而傅正之所以堅持民主，除了早年在武漢大學政治系讀到的一些民主理念，<sup>132</sup>主要是時代環境所造成的。他在「臨終遺言」頭一句話就寫道：「生逢戰亂，親歷抗戰尤其國共大內戰悲劇，而堅信和平民主之可貴。」<sup>133</sup>特別是國共內戰期間的逃難經驗，更令他刻骨銘心，<sup>134</sup>由此經驗進一步淬煉出堅固的民主信念。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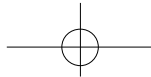
.....

<sup>130</sup> 尤清：〈贊助傅正，支持民主—推薦傅老師的三本文選〉，收入傅正：《傅正文選》，頁17。

<sup>131</sup> 傅正：〈請支持我為民主而戰！一寫在「開火」、「挑戰」、「戰鬥」三本文選前面〉，收入傅正：《傅正文選》，頁25。

<sup>132</sup> 傅正：〈從蔣經國到雷震之路！—叫我如何不想他〉，頁352。





親身經歷了國共兩黨用槍桿子搶政權的血淋淋教訓後，更堅定了我對民主的信念。……所以，四十年來，我在臺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sup>135</sup>

由此可以看出，經由苦難所淬煉出的民主信念，成了傅正日後政治志業的優位信念。

另外，分析傅正的著作可以發現，「國家工具論」乃是其民主信念的核心思維。所謂「國家工具論」，是指「國家只是工具，個人才是目的」的政治觀點或信念。從 1950 年代傅正發表在《自由中國》最初的幾篇文章中，即可看出傅正強烈主張此一觀點。<sup>136</sup>就其意識型態的傾向來論，殆近於洛克（John Locke）以個人主義為主體而展開的自由主義國家觀。<sup>137</sup>另外，在他看來，國家不僅只有「工具性」的意義，相對於「世界」而言，國家也只具「階段性」的意義。擴而大之，就整個「宇宙」的角度來看，甚至連「世界」一樣也只具「階段性」的意義。<sup>138</sup>再者，他認為：「人之所以可貴，並非因為屬於那一個國家，而是由於人的本身有其不容否認的人格尊嚴」，因為「人類之所以隸屬於某一個國家，原是一種極偶然的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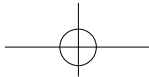
.....  
<sup>133</sup> 傅正：〈傅正臨終遺言〉，收入宋英等著：《傅正先生紀念集》，頁 43。

<sup>134</sup> 傅正：〈我為什麼兩次參加組黨？〉，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頁 10。

<sup>135</sup> 傅正：〈請支持我為民主而戰！一寫在「開火」、「挑戰」、「戰鬥」三本文選前面〉，頁 20。

<sup>136</sup> 傅中梅（傅正）：〈個人自由乎？國家自由乎？〉，《自由中國》，9：6（1953 年 9 月 16 日），頁 175-176；傅正：〈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上）〉，《自由中國》，13：6（1955 年 9 月 18 日），頁 171-174；傅正：〈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下）〉，《自由中國》，13：7（1955 年 10 月 1 日），頁 203-206；傅正：〈國家要把人當人〉，《自由中國》，15：7（1956 年 10 月 1 日），頁 605-606。

<sup>137</sup> 傅正認為：「國家只能以人為目的，發揮其工具的性能；超過這範圍，便沒有存在的理由和價值。這個原則，實際上是一般學者所公認的。例如洛克（Locke）認為：政府的目的，是在謀『人類的幸福』。」傅正：〈國家要把人當人〉，頁 9。



緣，這是由於自己的父母屬於某一國家，或是出生的地點在某一個國家，如此而已」。<sup>139</sup>

由此可以看出，傅正是用「工具性」、「階段性」與「偶然性」來解消國家的神聖性，從而凸顯人的「目的性」、「永恆性」與「必然性」，進一步彰顯人生真正的意義與價值：

人只有被國家當做人看待，才能意識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才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由盡人之性，進而盡物之性；再由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進而與天地相參。唯有如此，人類才可能感覺到：人生是喜劇而不是悲劇，國家是可愛而不是可怕，世界是可戀而不是可厭。<sup>140</sup>

凡此皆可看出，最晚從 1950 年代開始，他已逐漸形成其「國家只是工具，個人才是目的」的信念。一直到晚年主編《雷震全集》時，<sup>141</sup> 乃至於生命結束前八個月的一場學術研討會上，他仍對此一信念關切再三。<sup>142</sup> 要探究傅正來臺四十年間，何以能無怨無悔地參與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運動，除瞭解其時代背景，必不可忽略其對民主理念的深刻觀照。

.....

<sup>138</sup> 他說：「人類的生活範圍，還只能止於這個地球（世界）的時候，人類的最終境界應該是世界主義，而不是國家主義。假使人類的生活範圍，已經擴展另一個星球以至另幾個星球的時候，人類便該放棄世界主義，而採取宇宙主義。」傅正：〈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下）〉，頁 13。

<sup>139</sup> 傅正：〈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下）〉，頁 14。

<sup>140</sup> 傅正：〈國家要把人當人〉，頁 9。

<sup>141</sup> 例如，「雷震日記」（1958.11.27），傅正註。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頁 413。

<sup>142</sup> 傅正：〈《自由中國》的時代意義〉；傅正評論李鴻禧：〈雷震之憲法學者像素描〉，收入澄社主編：《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0、349-373。